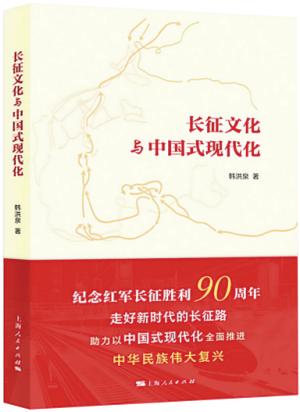


陈云第一次向世界宣传了长征

□韩洪泉



《长征文化与中国式现代化》
韩洪泉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长征文化与中国式现代化》是一部向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献礼的理论读物,作者韩洪泉是国防大学政治学院副教授。该书以“长征文化”为经,以“中国式现代化”为纬,深入探讨了长征文化与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在此摘编书中关于长征文化国际传播的部分内容。

全球维度下的长征文化

长征文化既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也具有普遍的世界意义。

在漫长的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广为人知的远征故事不少。值得注意的是,20世纪20年代中期,南美洲的巴西有一支起义军进行了一次与后来中国工农红军的长征极其相似的远征行动,即普列斯特斯纵队长征。在两年多的时间里,这支3000余人的部队在普列斯特斯的指挥下,两次穿越巴西全境,转战14个月,行程达到2.5万余公里,与20倍于己的政府军进行了上千次战斗,创造了世界军事史上的奇迹,普列斯特斯则被称为“希望的骑士”。由于纵队在与优势政府军的激战中损失惨重,普列斯特斯最后率余部600余人撤退到玻利维亚境内,宣布放下武器、停止斗争,轰轰烈烈的普列斯特斯纵队长征结束。

从埃德加·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西行漫记》,Red Star Over China)开始,世界上关于红军长征的报道和研究中,都会有意识地将红军的长征与世界历史上其他远征行动进行比较。埃德加·斯诺认为,长征是世界军事史上最伟大的奇迹之一,与红军长征相比,汉尼拔率军翻越阿尔卑斯山的远征,“看上去像一场假日远足”。

翻译过《孙子兵法》的美国军事史家塞缪尔·格里菲斯将红军长征与色诺芬的长征进行比较,指出红军在时间跨度、转战距离、军队数量上都远超后者,而其“意义不知要大多少倍”。哈里森·索尔兹伯里认为,“没有任何比拟能恰如其分地形容长征”,“长征举世无双”。

如果将红军长征与世界历史上其他远征进行比较,我们可以发现,红军长征就时间来说并不是最长的,也很难说是距离最远的,就战绩来说也许不是最辉煌的。但红军长征所产生的影响却是其他长征所不能比拟的。世界上之所以对红军长征给出高度评价,应该主要还是在于其表现出的正义性质、伟大精神和深远影响。

正如许多外国学者所指出的那样,红军的长征不只是一次杰出的军事行动,还是一个产生深远影响的政治活动。从后来历史的发展走向看,中国共产党在长征胜利“十三年”之后,就取得了全国胜利,把国民党赶下大海。这样,长征在性质上就由走投无路的撤退,变成走向胜利的序幕,“长征简直是将革命划分为‘公元前’和‘公元后’的一条分界线。其后发生的一切事情,都要从这个举世无双的奇迹说起”。

正是从这些意义上来说,长征对于中国、对于世界都是独一无二、无与伦比的。在外国学者看来,“长征已经在各大洲成为一种象征,人类只要有决心和毅力就能达到自己的目的”。这一举世无双的奇迹,汇集了人类长征故事的精粹,彰显了人类长征精神的崇高,升华了人类长征文化的意蕴,成为人类长征以及有着长征共性特征的奋斗目标及其过程的代名词和标志符号。

《随军西行见闻录》巧用“第三视角”

几千年来,远征在世界范围内作为一种文化符号和词汇概念,可谓源远流长。古希腊《荷马史诗》中的《奥德赛》,讲述了奥德修斯率领希腊将士经过10年海上历险最终顺利回家的故事。古希腊历史学家色诺芬的《长征记》,记述了作者亲身参加的一次远征,

之一。几十年来,《红星照耀中国》被翻译成多国文字,在世界范围内广泛传播,成为人们了解长征、了解中国的经典作品。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斯诺和《红星照耀中国》是一个伟大的开端。

受到斯诺的影响,一些西方记者和友好人士(如海伦·斯诺、艾格尼丝·史沫特莱、安娜·路易斯·斯特朗、路易·艾黎等)纷纷前往陕北采访,撰写了大量反映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真实情况的作品,长征往往是其中必不可少的部分,甚至是高潮部分。这些作品在海外的传播,扩大了红军长征的世界影响。

随着中国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世界各国加强对中国的了解的主观愿望更加强烈,客观条件日趋优越,长征文化国际传播掀起新的热潮,形成了持续繁荣的局面。1984年,斯诺的同事和朋友、美国著名作家、记者哈里森·索尔兹伯里和夫人来到中国,不仅联系和采访了许多亲历长征的健在者,而且不顾年老多病重走长征路,历时74天,行程1万余里,从江西一直到达陕北。1985年10月,索尔兹伯里著《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The Long March: The Untold Story)由美国的哈珀与罗出版社出版,立即引起轰动,《时代》周刊等作了大量报道。该书很快被译成多种文字,在全世界广为传播。

1985年,澳大利亚出版商哈罗德·威尔顿与20多名中外摄影家历时两个多月,沿着长征线路拍摄了大量珍贵照片,于次年出版了《中国——长征》大型画册,以7种语言在全球40个国家发行了24万多册,在国际上引起巨大反响,对于帮助西方了解中国当时的真实情况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长征壮举起到了极大的作用。

2011年,威尔顿集团与青岛出版集团合作启动《中国——新长征》项目,组织了由两位外籍作家和14位中外摄影师组成的主创团队,在重走长征路的基础上拍摄2万多张精彩图片,最终选择600余幅代表性图片编排成书。该画册以中、英、阿、德、法、西、俄、日等多语种面向全球出版发行,展示中国人民在新长征路上阔步前行的精神风貌、客观变化和历史文化成就。

2016年我国举办“英雄史诗不朽丰碑——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主题展览”时,曾开设外宾专场,邀请103位在华外国专家、商务机构代表以及163位驻华使馆集中参观,产生了很好的宣传效果。

应当看到,在长征文化国际传播中,国外关于长征的研究和宣传有其独特的优势和长处,也有明显的不足和缺憾。比如一般只关注到中央红军(红一方面军)的长征,对红二方面军(红二、红六军团)、红四方面军、红二十五军的长征关注不够或一笔带过;对长征的时间范畴通常也只限定在1934年10月到1935年10月;甚至对长征中的重大事件、重要会议的时间顺序、空间位置等没搞清楚,致使讹误百出,在一些新闻报道中尤其如此。再如关于长征的里程,国内权威的观点是约2.5万里(中央红军),或者加上另外几支长征队伍的里程,一共是6.5万里,国外流传较广的观点是6000英里(约1.8万里),甚至有人重走部分长征路后认为长征的里程只有1.2万里到1.3万里,西方媒体曾以“不那么长的长征”为题争相报道,这一错误观点已受到中国学者有理有据的反驳。

此外,由于话语体系、研究范式、历史资料等方面的差异,国外的一些长征研究每每有雾里看花之感、方枘圆凿之失。总体来看,这些问题在近年来已经有了很大改观。

对于中国和世界来说,长征都是一场永远在路上的行程。长征是我们的昨天,新长征是我们的今天,关注长征和新长征,也就是在关注我们共同的明天。这或许正是长征文化国际传播最大的现实意义。

·技术与人类·

人类不需要AI有更高的智能

□刘永谋

很多人意识不到,更有益的AI与更智能的AI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更智能的AI,意味着更道德敏感的、更能像人一样进行道德判断与决策的AI,但并不意味着更有益。必须记住:AI设计的目标不是更智能,而是更有益。

并非自主性越高、越有智能,越像人的AI,才是好的AI。为此,就AI发展方向,我主张“有限AI设计”,即聚焦于AI更好地与人互动,更好地服务于人类,使之扮演好强大的功能性工具的角色。在我看来,Robot——这个词源于捷克语,意思是“机器劳工”——它应该扮演的是无意识的劳工角色。此外,想法则对于人类无益。

具体到AI道德问题上,我主张“AI去道德化”,即AI设计不需要使AI“有道德”。

人类的道德行为混乱而不一致。对于同一个情境,不同人判别结果不同;有道德水平高的人,有道德水平低的人。比起让AI“更道德”,避免AI“越过”道德底线,做出明显不道德的行为,是AI设计更可行的方案。

还有人,说AI道德可以通过社会学习来解决,即让AI在真实的社会互动中学习人类道德。但这种观点的漏洞在于:第一,社会学习的结果,完全无法预计。有个尽人皆知的AI学习语言的例子:聊天AI在网上跟人学说话,结果很快满嘴脏话、痞话和种族言论,设计者不得不把它给关掉。社会性的道德养成可能失败,社会学习之后AI也可能成为罪犯。第二,我们会不能承受AI养成失败代价呢?显然,不行。一个道德败坏而无所不

·序跋集·

贬到黄州,他才成为苏东坡

□刘墨

我写完《苏东坡的朋友圈》后,出于页码的考虑,接受出版方的建议,删减了一些章节。如今,那些章节经过很大程度的修订,成为这本《如轼:苏东坡的后半生》,我自己特别喜欢这一部分。在我的心中,乌台诗案后,苏轼被贬到黄州,从他自号“东坡居士”之时,便意味着他从“苏轼”变成了“苏东坡”;只有到了黄州之后的苏东坡,才是真正的苏东坡。

黄州之后的苏东坡才是真正对陶渊明心念。他不仅将陶渊明的诗全部和了一遍,还多次书写过陶渊明的名篇《归去来兮辞》。我以为,苏东坡的后半生,正是循陶渊明之路,在最简朴的生活中逐渐发现和确立自我的价值与意义。

曾经有友人问我这本书与《苏东坡的朋友圈》的区别。我答:如果说《苏东坡的朋友圈》里写的都是他与一些历史上的“大人物”的交往,那么,这本《如轼:苏东坡的后半生》写的就是他与生活中的“小人物”的交往。从他到日常生活中的“小人物”的交往中,更能见到苏东坡身上的入文精神与生活趣味,因而在这本书中,还可以看到他到与酒、茶、食物与石头之间的关系。

在我看来,这是苏东坡对中国人的生活的贡献。

虽然有许多人自认为对苏东坡已是再熟悉不过,然而正如我一贯所主张的,苏东坡并不是历史上的一个“标本”,而是仍然“活着”的、只是比我们今人大了九百多岁的人,所以

·科海无涯·

瓦特的创投故事

□陈洁

成功改造蒸汽机、引领了第一次工业革命的瓦特,已经家喻户晓。然而“一个篱笆三个桩,一个好汉三个帮”,瓦特的背后,切切实实有“三个帮”。

第一个人叫约瑟夫·布莱克,格拉斯哥大学的物理和化学教授。瓦特生在匠人之家,几乎没有受过正规教育,在钟表店当学徒又没有出师。就这样一个年轻人,却意外地被布莱克看中,介绍进格拉斯哥大学的校办工厂,负责维修教学仪器。

布莱克教授给瓦特提供了人生第一个高平台。在工作中,瓦特开始琢磨改造蒸汽机,但没有成功,而且债台高筑。这时候,瓦特认识了一个富有的企业家和化工技师罗巴克,罗巴克年近五十,拥有炼铁厂。他和三十来岁的瓦特签订了非常冒险的合同,赞助新式蒸汽机的研制。结果,瓦特用三年多的时间制成新样机,获得了第一项专利。但样机的功效比传统的还差,而罗巴克被瓦特拖得濒临破产。

即使这样,罗巴克还是信任瓦特,并把他的介绍给自己的朋友兼债主马修·博尔顿。这是瓦特生命中的第三个也是最重要的“贵人”。

博尔顿是工程师、富商、科学观察家,当地科学社团“月亮社”的主要成员之一。认识博尔顿时,瓦特的状况非常糟糕。他和赞助者罗巴克同时陷入绝境,债台高筑;同时,他的表妹兼妻子去世,留下四个孩子,生活和研究都濒临破产。

博尔顿在经济和精神上鼓励瓦特,不但全额赞助他继续做创新试验,为他安排住处、实验室和车间,而且将他介绍进“月亮社”。瓦特在那里接触到了当地一流的科学家和工程师,他开始从科学的高度来改进技术问题。有了资金保障,瓦特放开手脚干,生产出



刘永谋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著有《智能革命后的世界》。

能的超级AI,可能毁灭整个社会。并且,AI并不能真正承担犯错的责任。你打机器人,拆了机器人,它没有感觉,谈不上所谓惩罚。对于社会而言,物理惩罚机器人没有任何意义,也产生不了预防机器人犯罪的震慑作用。

事实上,所谓人工道德、机器道德,更多的是某种修辞学,并非真正实指的“道德”。只有人与人之间才有道德问题,人与机器之间的道德问题本质上是以机器为中介的人与人之间的道德问题。

AI道德设计的本质是对AI行动规则的制定,即让AI在现实社会情境中,能采取合适的行动,包括停下来,等待下次机器操作的指令,而不是像布里丹的驴子一样死机,或者根据随机算法做出反应。当前AI的行动规则是有限的,即局限于它的功能情境之中。比如,自动生产汽车的机器人需要处理的是工厂中的、与生产汽车相关的问题,不需要它能应对在工厂之外的社会环境,也不需要它处理与生产无关的问题,比如让它给工人跳个舞。

人类从AI的能力中获益,而不是从它的更高尚中获益。对于人而言,AI行动规则设计最重要的是可预见性,即与机器人互动的人类能预见它的可能的反应。如此,才能成为真正的人机互动。更重要的是,可以提前预知互动结果时,对于可预计的不理想结果,人类可以进行提前的人工干预。不可预计的AI不可控,更不安全。

我们并不需要机器人有更高的智能,而是需要它们有更强的、可控的和可预见的能力。



摘编自《如轼:苏东坡的后半生》作者后记。

他从来没有远离我们,只要我们一想起他来,他的形象就是鲜活、生动的、丰富的、有趣的……关于他的文献史料之完整与丰富,历史上几乎没有哪位文人可以与他相比;如果再加上一些民间故事传说,那绝对称得上是汗牛充栋。

不过,秉持我自己的学术理念,我觉得在诸多史料中的“间隙”,仍然有“未发之覆”,就像我把这本书写完之后仍意犹未尽一样。曾经碰到过几位学术界的前辈,都以同样的问题问我:“你写的书是学术性的吗?”我不太想回答这样的问题,因为每个人对于学术的理解并不一样。如果仅仅把史料堆砌和极少数人甚至无人阅读视为“最严谨”的“学术”,那我觉得这样的“学术”是没有生命力的;当然,为了好读,而往史料里加“奶”加“蜜”,也是我所不取的。

在此书即将结稿之际,我去了一次庐山,并住在开先寺之中。那里有一座苏东坡曾经两次去过的漱玉亭,虽然原来的漱玉亭早已毁弃,但记录了苏东坡题名的石柱仍静静地安放在寺院的一个角落里。当我用手指仔细地在刻痕中寻找苏东坡的书写习惯时,那一刻我感受到了与苏东坡的最近距离,也仿佛有种力量在我的指尖上微微地颤抖着……

历史从未走远,文物也不是标本,它们以各种各样的方式与我们的生命互动着,或静观,或感动,或启示,或回忆,或追寻。

苏东坡对我们的意义,也在于此。



陈洁 科普作家,北京理工大学副教授,著有《山河判断笔尖头》《何以科学家》等。

两台耗资巨大的新式蒸汽机,结果仍不成功,博尔顿也被拖得几乎破产。博尔顿没有“止损”,他咬牙支持瓦特。他说,他在投资“力量”。

钱烧到第九个年头,终于有了回报。1782年,瓦特研制改造的联动式蒸汽机问世,果然显示出强大的力量,世界工业走进了蒸汽时代。蒸汽机强劲地推动了英国的工业化进程,并直接推动英国称霸全球。在此历史过程中,发明者瓦特和投资者博尔顿名利双收,自不待言。

博尔顿和瓦特的合作,在当时起到了极大的社会示范作用,在后世也不断被人传颂。在瓦特的墓地旁,“月亮社”纪念牌、博尔顿旧居改建的博物馆里,瓦特和博尔顿这对友好合作的典范,都待在一块儿,亲密又友好。

当然,事情的真相并不那么美好,至少是不完美。在钱的问题上,两人多少有些矛盾。瓦特童年的拮据导致了他对金钱的贪婪、焦虑和不安感,一辈子他都没摆脱。蒸汽机改造成功后,瓦特时刻警惕别人盗用他的专利,或超过他的发明。为了保证责任,他不惜利用自己在学界的地位压制别人的发明和探索。

对于专利收入,投资人博尔顿获利三分之二,创研人瓦特只有三分之一,瓦特对此也有微词。只是有合同在,微词也只能是微词,这里涉及很重要的一点:契约精神。但两个当事人的磕磕碰碰、别别扭扭,都在所难免。

正好两个家伙毕竟共患难,还是坚持将合作进行到底了。他们的合作延续到后代,小马修·博尔顿和小詹姆斯·瓦特共同经营着父辈的公司,继续双赢,继续见证社会的飞速发展。总之,虽然不那么完美,瓦特和博尔顿这对“英国合伙人”,仍然堪称楷模。

快 览

《学神的习惯:中国拔尖学生成才规律与培育方法》 方士心 著 上海三联书店

本书挑战了传统应试教育中的“学神”迷思,重新定义了卓越学习的内涵——他们不是遥不可及的天才,而是不断探索、反思,并致力于终身学习的个体。通过科学的学习方式,每个学生都可以激发潜能,全面发展人格、学业与情感。不同于应试指南,本书注重学习的本质、情感健康与内在动机。



《大明尚书方逢时》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嘉鱼县委员会 编 湖北人民出版社

方逢时,明代政治家、军事家,湖北嘉鱼人,官至兵部尚书,兼领吏部尚书。本书是其首部传记,重点讲述他与俞大猷、戚继光互相配合击退倭寇保国家安宁,促成“隆庆和议”促进明蒙经济文化交流,推动“茶马互市”为“万里茶道”的形成奠定基础,助力张居正改革推动朝政革新等代表性事迹。



《天边》 张者 著 作家出版社

讲述为共和国屯垦戍边事业做出巨大奉献的兵团人故事。作品巧妙地采用三位少年的视角展开叙事,将兵团二代的成长和人生的抉择,与兵团艰苦卓越的奋斗历程紧密贴合,真实展示新疆兵团人的生命底色,描绘了一幅新疆大团结大发展的时代画卷。



《大地艺术家:北方牧人》 白玛措 著 商务印书馆

本书收录的文章短小精悍,通过具体的人物和生动的故事展开叙事,为读者呈现神秘羌塘高原的历史与人文。这些素材均来自作者长期在牧区从事人类学田野调查的第一手资料。通过文学人类学的写作方法,作者以不同的角度和视野为读者展现了普通个体和游牧文化的独特性。



《经过检视的人生:从苏格拉底到尼采》 [英]詹姆斯·米勒 著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哲学史有多枯燥,哲学家的八卦就有多精彩!如果说未经检视的人生不值得过,那么经过检视的人生又会如何?打破哲学家的完美滤镜,撕掉高深课本的枯燥外衣,这本充满“人味儿”的有趣传记将带你闯进12个惊心动魄的生命现场!



《观鸟大年》 [美]马克·奥布马斯克 著 上海译文出版社

在北美,“观鸟大年”是一场没有裁判、没有奖金、没有奖牌的极限挑战。1998年,恰逢百年最强厄尔尼诺,风暴席卷,罕见鸟讯如雪片般飞出,令整个北美观鸟圈陷入疯狂。他们平均年龄近六十,却踏上了一场横跨大陆、飞越重洋、深入垃圾场与雪山之巅的“观鸟军备竞赛”。



(长江日报记者李煦 整理)